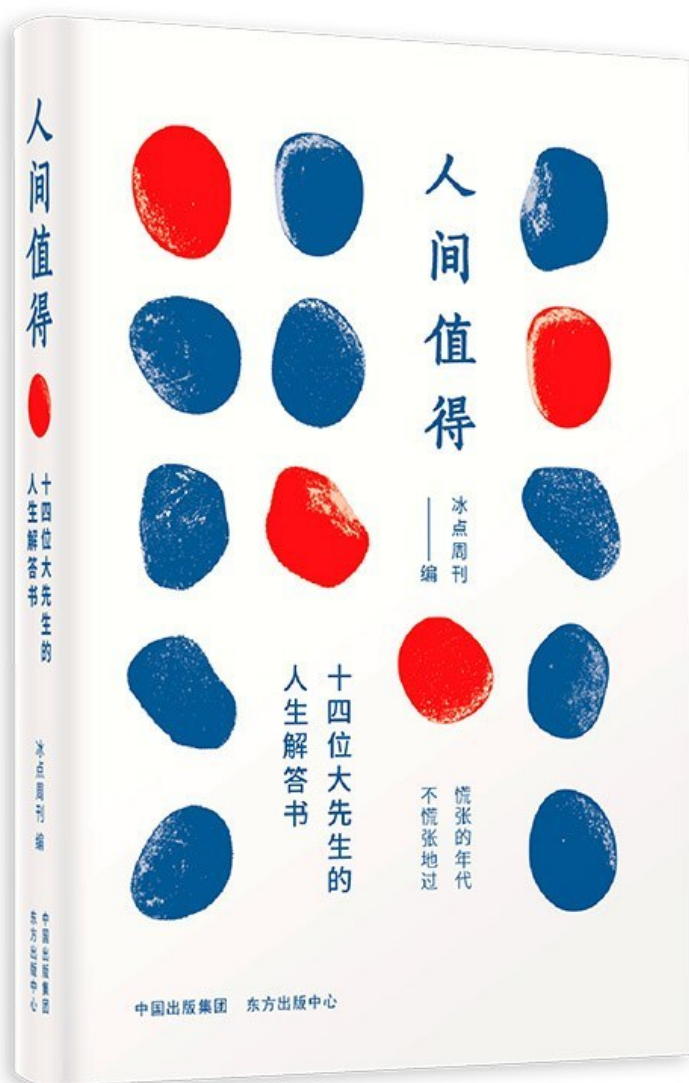


《人间值得——十四位大先生的人生解答书》摘抄

冰点周刊 著

2025 年 1 月 10 日



书本封面

1. 晚年，她（[杨绛](#)）不止一次告诉别人：“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上海沦陷时，为了让丈夫安心写《围城》，她自己扛起了生火烧饭洗衣的担子，常常被煤烟熏成花脸，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她曾被叫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出门手边还不忘带一卷《杜诗镜铨》。日本人见到她，先笑说：“杜甫的诗很好啊。”
2. 他（方成）和丁聪、华君武并称“中国漫画界三老”。2009 年丁聪去世，一年后，华君武走了。如今，这棵“常青树”也凋零了。
3. “叶先生（[叶嘉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诗。”无从考证谁发明了这句评语。多年以后，它在南开的学生中流传。
4. 也正是在纽约的地铁上，20 世纪 80 年代初赴美留学的陈丹青结识了日后被他称为“师尊”的木心。

“在我与木心先生相处约 29 年里，我亲眼目击他如何挚爱艺术，如他自己所说：人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陈丹青在悼词中写道。

5. 一次听木心的开场白，他说：“在一个万国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房屋，里面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接待路过的所有类型的朋友，有强盗，有英雄，有商人，有学生，有流浪汉，等等，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接待，都可以请进来，都可以长谈，这个老人就是文学。”
6. 在林家翘人生的文件夹里，流动稳定性理论是重要的一页。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他在流体力学的流动稳定性和湍流理论方面的工作带动了一代人的研究和探索。

台湾已故的天文学家袁旗是林家翘的学生。他生前曾撰文回忆，因为流体力学稳定性理论，林先生在流体力学界的外号是“不稳定先生（Mr Instability）”。

在袁旗的回忆中，林家翘个子不高，外表温文儒雅，待人和气，内在又非常强

韧。他祖籍是福建，但因为在北京长大，讲一口“京片子”，他的伯父林旭是清末戊戌变法中牺牲的六君子之一。

他说，林先生绝不抢人家的研究成果，总是会把他人的研究成果公平地归于其创造者。他甚至一再把密度波的创始归功于林德布，其实林德布教授提出的密度波“非常粗略、原始”，与林先生精心构建、演绎出来的理论不是一回事。

袁旗还记得，林家翘 70 岁寿辰时，到场祝贺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忆起一件事情。李政道在费米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费米告诉他粒子物理没有前途，要他去做天体物理学，他就去跟钱德拉塞卡做天体物理学，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钱德拉塞卡告诉他，天体物理学没有前途，要他去做流体力学。李政道又去请教林家翘，结果林家翘告诉他，流体力学没有前途，所以李政道最后又回到了粒子物理学上。

等到林家翘 90 岁寿辰时，袁旗记起此事。他猜测，如果问 90 岁的林先生，做天体物理学前景如何，或许他会说天体物理学没有前途，去做生物物理学把。

“不稳定先生”以 97 岁的一生游走多个领域，成了天才式传奇人物。

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是著名的导弹之父奥多·冯·卡门。人们至今津津乐道，从大师冯·卡门的门下，走出了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等群星闪耀的名字。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有一次当众回忆说，在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当中，“最聪明的是林先生”。

坐在轮椅里、白发苍苍的林家翘认真地纠正这位老友：“我也是用功的那种——不敢说是最聪明。”

7.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是杨振宁晚年仿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设立的。在杨振宁将精力转向清华之际，陈省身两次让葛墨林（[葛墨林 1986 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给他带话：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是你的“亲儿

子”，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是你的“干儿子”，两个儿子，你都要管。

8. 20 世纪 80 年代，杨振宁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文集，收录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谈话，有些地方对“文革”某一方面的事物持赞成态度，而他事后也发现了当时的不足。预先看到文稿的葛墨林劝他删掉这些内容，不要引起误会。杨振宁却执意全部发表。他说，自己就是要全都拿出去，让人家可以了解杨振宁真正的心路历程。
9. 他（[周传基](#)）公开批判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对电影的定义是“谬误”，“连电影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他对他的学生张艺谋、陈凯歌同样严苛，总觉得他们“做得还不够好”。陈凯歌《霸王别姬》之后的作品，老先生都不大满意。
10. 这位（[侯仁之](#)）徐霞客式的旅行家带走了一个时代——至此，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三驾马车”，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都已魂归故土。
11. 侯仁之把自己 102 年的人生都绘在这些地图上，他的旅行就在那如沧海桑田变换的山川、河海、建筑之间发生。他早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历史学家顾颉刚、洪业，后来跟随英国当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亨利·克利福德·达比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那是历史地理学在国外诞生的年代。他 1949 年留英归国，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人之一，扶持着它从“几门学科的边缘中发育成长起来。”

今日学界公认，侯仁之 1950 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1962 年发表《历史地理学刍议》，第一次在理论上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指出传统沿革地理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区别，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2. 出于对北京共同的钟爱，侯仁之曾与梁思成共事，为北京城的规划和保护尽力。北京的起源地莲花池，以及后门桥、卢沟桥等，都因他的呼吁得到保护。

1993 年，庞大的北京西站即将修建，将成为北京新的“大门”。一个选址方案

是建在干涸多年的莲花池上，可减少拆迁，也便于施工。而侯仁之早就考证过，莲花池畔是北京城的起源地。

听说此事后，他以八旬高龄现场查勘、呼吁，最终使西站的主楼东移了 100 多米，莲花池保留下来。随后几年他又多次建议恢复莲花池的水源，当面向市领导演示自己绘制的地图。根据他的建议，北京市对莲花池和后门桥作了修缮，2000 年 12 月 21 日举行了修复开园仪式。就在前几天，侯仁之摔了一跤，但仍坐着轮椅到场。因为总在惦记莲花池之事，他甚至在看病取药时，随手在药盒背面写下自己的想法。

他将莲花池的大幅照片挂在自家的客厅里，这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

13. 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看病——这是侯仁之选择大学专业时，胞弟侯硕之给他的忠告。
14. 侯仁之的赠言中说，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足食而满足。“一个青年能在他 30 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15. 艺术家熊秉明给侯仁之赠过一首诗：“黑板映在孩子们的眼睛里/我在孩子的眼睛里写字/写了又擦去/擦去了又写/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有些字是擦不去的么/我在孩子们眼睛里写字。”
16. 1955 年之前，周有光搞的是经济学，在大学里教过书，也在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当过官。1955 年之后，作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他又一头扎进语言学领域。他参与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让人们能够依靠 26 个拉丁字母，轻松地在键盘上敲打出汉字。
17. 这时（1980 年）他才惊讶地发现，世界各地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富裕得“出乎他的意料”，单一所香港大学的经费比北京所有大学加起来都多。当年他

任职新华银行时，银行在香港只有个很小的分行，此时却已有 77 个办事处，这一变化让他印象极其深刻，他又着急地眯缝着双眼探究世界。

18. 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等多个学科都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来新夏，素以“纵横三学，自成一家”闻名。但他自谦只是“一个读书人”。
19.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20.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单用一个“答”字不太合适，所以用了“求答钱学森之问”。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21. 他（[田家炳](#)）曾是京华银行董事、田氏塑料厂董事长，曾拥有东南亚最大的人造革制造厂。但人们悼念他，更多是因为他是田家炳基金会的创始人。受过他捐赠的学校几乎遍布全中国，包括 93 所大学、166 所中学、41 所小学、19 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还有 1800 多间乡村学校图书室。
22. 这个分量（[0.4 毫克](#)）藏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生命开始孕育的时候。由于严仁英的推动，中国孕妇开始在备孕前后每日口服补充 0.4 毫克叶酸，以预防新生儿神经管发育畸形。世界卫生组织备孕叶酸的补充标准由此确定，60 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也因此得到改写。

在此之前，严仁英调查发现，围产期中，差不多每 40 个胎儿中就有一个死亡。而在不良妊娠结果里，胎儿神经管畸形的问题发生率高达 4.7%，居于首位。而当时

有文献报道的 20 多个国家中，近 20 年的神经管畸形发生率只波动在 0.3% ~2.1%。

23. 但是，当严仁英刚从严家大院高墙走出来后，却发现“墙外有墙”。27 岁那年，她想要留在协和医院工作。可在严仁英看来，根据美国医院的惯例，女医生如果结婚，将不会有职业发展，常常会被调去看门诊。她的恩师、协和第一位中国籍妇科主任林巧稚就是终身未嫁。

24. 从此，江村及费孝通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围绕着这个小村，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费孝通那个一步一步拓展自己的调查和思考。正如费孝通的导师，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25. 改革开放后，以敏锐的眼光和勤奋的脚步，年逾七十的费孝通“行行重行行”，陆续发现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并予以肯定和保护。

曾名震一时的“苏南模式”——以乡镇企业实现农民“原地城镇化”的模式，最早即来自开弦弓村这块学术宝地。在 80 年代初对开弦弓村的考察中，费孝通看到了社队企业对农民增收的巨大作用。这和他 30 年代的复兴乡土工业的思路对上了。

26. 1980 年，赴美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的马林诺夫斯基奖时，费孝通发表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演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目的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

27. 1952 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的社会学，在院系调整中被取消。

三十多年后改革开放时，社会学又重新得到重视。

1979 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提到，社会

学的研究，以前被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而在 1978 年，胡乔木就登门拜访，邀请当时还在赋闲的费孝通出山恢复社会学。这之后的 1986 年，在“江村调查”过去半个世纪后，《江村经济》终于有了中文版。

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的第一任所长，是复建的中国社会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恢复重建的重要推动者，并担任系主任。

28. 在之后（2015 年）的“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仪式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提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的农村在中国，中国的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的农村研究在美国。”